

# 親屬責任與社會救助：扶助或控制？

孫健忠

## 壹、前言

家庭是親屬（Kinship）關係中最主要的型態，在社會中擔任生育、情緒支持、經濟福祉、社會化、保護與親密等功能。就社會福利而言，家庭是一個重要的福利供給者，除了扮演照顧的角色外，也提供成員金錢與實物的協助（Gilbert & Terrell, 1998）。當福利國家的危機出現後，家庭此種非正式部門更再度的被強調為福利的重要供給者，並希冀藉由規範家庭功能的回復，來減輕政府責任的負荷。

社會救助的目的是在舒緩貧窮問題，以保障國民的基本生存權。理念上，社會救助是幫助那些無法自行或自其他來源得到幫助的人；因此，社會救助雖是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 net）的維護者，但也扮演最後補充者的角色，也就是說係以家庭無法有能力照顧的人群為服務對象。實務上，經由財力調查（means test）中親屬責任原則的運用，排除那些可以自家庭獲得照顧的人口。

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家庭的功能與型態產生許多變化，同時社會的價值觀也發生諸多的轉變，原先親屬責任所建構與維繫的基礎迄今能否存在，成為必須要

思索的議題。換言之，我們是要作更務實的調整，有新的思維？抑或僵化的固守價值規範，仍築巢於舊有的迷思？本文的目的即嘗試對此作探討，首先就文獻面來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其後探討我國社會救助中的運作情形，再對現行的規定提出反省，最後則提出可能的修正建議。

## 貳、文獻回顧

社會救助的首要工作為對象的決定，亦即區分貧窮者與非貧窮者，而此就有賴財力調查。財力調查的實施涉及到資源的計算、需求的界定以及計算的單位。資源的計算包括所得調查（income test）與資產調查（assets test）；需求的界定，亦即需求調查（needs test），包括一般維生需求與特殊生活需求兩方面，前者泛稱為最低生活費，後者則視申請者的特殊情況（如年齡、障礙程度、單親等）而有不同的考量。至於計算的單位，在血緣關係與生活關係的考量下，一般而言有個人（the individual）、家庭（the family）與家戶（the household）三個可能的分析單位。

依據 OECD 國家的資料，如表一所示，無論是給付與資源均係以家庭為主要的計算單位，其次為家戶（Eardley et al.,

1996)。實質上，家戶的資源（含所得）不盡然與家庭資源相等，而家庭資源當然也與個人資源不同。在此情況下，單位的選擇反映著對家庭資源分配的不同觀點。若夫妻與子女不僅有關連且共同居住，在所得上是共享的，且消費也是共同決定，則

將家庭視為一個測量單位是適當的。若父母未與居住在家中的成年子女共享所得，則成年子女可視為一單獨的經濟單位。然而，家庭之間資源的分享與分配是非常難以確定的，答案因每個家庭而不同，甚至因每個月而不同。

表一 OECD 國家社會救助給付單位與資源單位的比較

國家	給付單位	資源單位
澳大利亞	家庭	家庭
奧地利	家戶（包括祖父母）	家戶
比利時	家庭	家庭
加拿大	家庭	家庭
丹麥	家庭（同居單獨）	家庭（同居除外）
芬蘭	家庭	家庭
法國	家庭	家庭
德國	家庭	家戶
冰島	家庭（同居單獨）	家庭（同居除外）
愛爾蘭	家庭	家庭
義大利	視情況，通常是家庭	視情況，通常是家庭
日本	家戶	家戶
盧森堡	家戶	家戶
荷蘭	家庭	家庭
紐西蘭	家庭	家庭
挪威	家庭（同居單獨）	家庭（同居除外）
葡萄牙	家庭	家庭
西班牙	家庭（同居單獨）	家庭
瑞典	家庭	家庭
瑞士	家戶	家戶
土耳其	家戶	家戶
英國	家庭	家庭
美國：(1) AFDC (2) Food Stamps (3) GA (4) SSI	家庭 家戶 家庭 個人	家庭 家戶 家庭 個人/家庭

此種單位的選擇更意涵著家庭責任與政府責任之間的分工，亦即政府如何看待家庭所應扮演的角色。以英國 1601 年的濟貧法而言，就明確規範父母扶養子女、丈夫扶養妻子、成年子女扶養年長雙親，甚至祖父母扶養孫子女的義務。然而，此種政府以法令規範責任的作法也有差異。如在英格蘭，資深世代的責任重於年輕世代，因此孫子女並沒有扶養祖父母的義務。但是在蘇格蘭，由於教區濟貧的範圍權利較狹，因此家庭的定義相對較寬廣，三代之間彼此有互相扶養的責任，甚至此種責任延伸至兄弟與姻親（Crowther，1982）。

其後，英國又改採家戶財力調查（household means test）將家庭責任範圍擴充。雖然如此，對於家庭的界定在其間也有變通的調整，如失業扶助局（Unemployment Assistance Board）引用「組成家戶」（constructive household）的概念，亦即子女雖然離開家庭，但仍被視為家戶成員，除非他被證明是被逐出。然而，對於成年失業者則給予「自尊錢」（dignity money），使得他們不致於完全要依賴父母。1948 年的法令，又由延長家庭轉為核心家庭，亦即親屬責任調整為夫妻之間，以及父母對 16 歲以下的子女具有扶養責任。

在濟貧法時期，家庭普遍的被視為社會的一個經濟單位，甚至當時的「慈善組織協會」（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也認為社工員應該盡所有能力促使家庭照顧其親屬。在此情況下，「家庭，而非個人，應被視為一個單位」，政府官員更指出：「假

若濟貧行政中家庭責任的原則被取消，會導致濟貧被視為權利、個人道德及社會雙受損害」。

雖然政府當局宣稱親屬照顧為「自然的」（natural）與「高尚的」（decent）情感，但是他們最主要的考量還是濟貧費用的支出。因此，在對貧窮者的處遇上是「道德」混合著「財務」考量。當政府面臨財政危機時期，家庭必須要承擔較多的責任。在蘇格蘭，公共救助當局可以拒絕給予救助，除非申請者同意對家庭扶養義務者提出控告的法律行動。事實上此種個案很少發生。然而，法律本身雖未挑起訴訟，但是卻會對申請產生阻難的效應，因為親屬有照顧的責任。

經由這些案例，明顯的可以看出親屬責任，就政府而言其防衛的立場是基於倫理與財務的雙重考量。然而，此種家庭責任的實施也引發了一些爭論：(1)在濟貧法時期，就有貧窮家庭報怨為何在繳納濟貧稅的同時，仍必須要扶養年長的父母，他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2)財力調查假定所有家庭的收入，不論其來源為何，都會對家庭預算有貢獻，然而，實際上並沒有人知道子女或薪資所得者有多少所得是如此的運用。(3)地方的裁量權影響到家庭責任，不僅是家戶的大小有差異，就連家戶中親屬的人數也因地方的經濟因素而有差異。(4)雖然家戶的界定看起來合理，但實際上其所涵蓋人員的縮減與擴增所依靠的不僅是家庭習俗（family custom），更可能受到住宅的情況、勞力的移動以及其他經濟因素的影響。換言之，家戶財力調查實質上是懲罰那些成員在一起的穩定家庭，

而非成員分散的家庭。

至於一般人所擔心的若將親屬責任鬆綁，將會妨礙到家庭的責任，亦缺乏實證基礎。1948 年英國引進核心家庭的現代親屬定義，如同經驗所顯示的，此種終結並不代表著家庭責任的終結，相對的，如果確保個人有一定的最低所得，其家庭成員更可以有效的提供必要的其他服務。

### 參、社會救助法的案例

廣義的社會救助並不僅是對貧窮者的協助，而是涵蓋所有經由財力調查所決定的給付與服務。就臺灣而言，經由財力調查所決定的給付與服務，除了低收入戶的扶助外，尚包括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婦女緊急生活補助、中低收入市民醫療補助等。然本文所處理的係以社會救助法的低收入戶申請為例。此外、本文所著重之點是在低收入者申請進入（entry）的過程，至於進入之後所涉及的家庭資源分配就不在討論之內。

關於親屬責任（扶養義務人）的規定，在臺灣社會救助發展的過程中，一直存在於相關的法令中。初期所依據的社會救濟法（民國 32 年），其第五條中就規定：「各款規定得受救濟者，如有受扶養之權利其扶養義務人具有扶養能力時，得不予以救濟；但有迫切情形者，不在此限。」民國 52 年臺灣省社會處針對分戶的問題，特別規定：「凡依法具有互負扶養義務之親屬應視為同一戶籍，不受戶籍簿上分戶登記之限制。」然而，在民國 55 年，為法理兼顧，省社會處又規定除直系血親應不受戶口簿上之分戶登記限制，仍應合併計算外，旁

系血親或有互負扶養義務之親屬，如經查明確已分戶而非共同生活者，一律不予合併計算（孫健忠，1999）。

民國 69 年制定的社會救助法第六條規定：「家庭每年總收入，依該家庭人數平均計算之金額低於第四條所定之標準者，得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生活扶助。」換言之，對於家庭責任亦作了規定。至於全戶（家）人口範圍，臺灣省、臺北市與高雄市各依其辦法規定。依據「臺灣省社會救助調查辦法」與「高雄市低收入戶調查辦法」中的規定，全家（戶）人口範圍包括：(1)直系血親。(2)旁系血親及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其在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者。「臺北市低收入戶查定辦法中」的規定原則上與前述相同，只是在直系血親後加上「但入贅或出嫁之子女無力負擔者，得不計入」。

再依據民國 86 年新修正的社會救助法，已將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範圍明確列入在第五條中。全家人口範圍包括：(1)直系血親。但子女已入贅或出嫁且不具扶養能力可資證明者，得不計算。(2)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旁系血親及負扶養義務之親屬。(3)綜合所得稅列入扶養親屬寬減額之納稅義務人。

依據前述的說明，可知臺灣社會救助歷年來均有全家人口範圍的認定，也就是這些對象的資源均必須合併計算在內。相較於其他國家，可以發現臺灣社會救助法在親屬認定上雖然歷年來有些調整，但整體上是相當的嚴格。以新法而言，不僅包括家庭的概念，且延伸至家戶的概念，甚至將列入扶養親屬寬減額的納稅義務人列

入計算。

在這個計算單位的認定下，臺灣社會救助實務的運作中出現了三種類型的問題，如表二所示。第一個類型為直系血親，特別是父母與子女之間，此包括：(1)子女分戶，特別是成年子女，以致於無法從直接文件中得知申請者是否有子女。(2)雖然子女未盡奉養之責，由於子女的所得必須要合併計算，導致父母申請資格不符。(3)成年身心障礙者，必須要與父母合併申報，因而不符合資格。(4)女兒出嫁後多不考慮扶養能力，直接不列入計算，形成對兒子的不公平。

第二個類型為夫妻關係變化下的問

第三個類型為旁系親屬的問題，特別是同胞手足之間，此包括：(1)同戶籍但未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要納入計算，因而不符合資格。(2)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納入計算，因而不符合資格。

在這些問題類型之下，社工員常面臨案主現實生活確屬困境，但卻因不符合資格而無法提供扶助的兩難。為了對案主的需求作回應，社工員也會運用法律所賦予的裁量權。由於社會救助是地方主其責，並未多有監控機制，因此，在專業裁量權之下，社工員就有很大的空間決定是否要將未同住的直系血親合併在內、是否要將同一戶籍但不同住之間作一區分、是否要

表二 社會救助法親屬責任認定的問題類型與說明

問題類型	問 題 說 明
直系血親之間	(1)子女分戶，資料不易察覺。 (2)雖子女未盡照顧之責，但父母不符合資格。 (3)成年無工作能力子女，仍依賴父母，缺乏自尊。 (4)出嫁女兒多不列入計算，形成對兒子的不公。
夫妻關係之間	(1)單親女兒返家，與父母要合併申報，因而不符合資格。 (2)父親對離婚子女仍有扶養義務，列入計算引起困擾。 (3)先生（或妻子）離家，仍列入計算，因而不符合資格。 (4)受虐婦女，先生仍列入計算，因而不符合資格。
同胞手足之間	(1)同戶籍，但未共同生活，仍列入計算，因而不符合資格。 (2)共同生活，反而要納入計算，形同對照顧的懲罰。

題，此包括：(1)女兒離婚攜子女返回父母家，因父母資源要合併申報，因而不符合資格。(2)母親攜帶離婚子女，由於子女的父親有扶養義務，因而引起所得要合併計算的困擾。(3)丈夫（或妻子）離家不照顧家庭，但仍要計入家庭人口，因而申請不符合資格。(4)受虐婦女攜帶子女，因先生要列入，不合於資格。

將旁系血親納入、是否入贅或出嫁的子女直接不列入計算等多種權宜處置。

就實務經驗的歸納，社會救助調查人員在裁量權的行使下時有下列變通的作法：(1)若子女確實未盡照顧責任，則由村里長出具證明採認。(2)若先生離家未盡照顧責任，則由村里長出具證明採認。(3)受虐婦女，先生可不列入計算。(4)單親母親

返家雖與父母同住，不將父母列入計算，但因與父母同住，雖照顧年幼小孩，不將其視為獨力扶養，必須要視為家務工作者核計薪資，因而會出現其合於低收入戶資格，但要降款的情事。(4)成年身心障礙者與父母兄弟同住，在計算所得時僅將父母納入，若合於低收入戶資格，則僅單列身心障礙者，因為其父母有其兄弟扶養。(5)失怙兒童與祖父同住（也可能有其伯叔等親戚），在計算資源時僅將其祖父納入，若合於低收入戶資格，則僅單列其孫子女，因為祖父有其伯叔照顧。

此種裁量權的運用，並沒有一致的規範，因而鄭麗珍（2000）以七個案例的審查結果，指出：「即使面對相似或相同家庭背景資料的案例，因審查的工作人員不同或參考的判定原則差異，申請結果常大相逕庭，顯示財力調查這個黑箱似的決策流程隱含相當大的主觀判定空間，且其間的參考原則也具有相當高的變異性。」

#### 肆、問題的試析

依據親屬法研究學者的觀點，臺灣基本上是採家屬主義，不取個人主義（戴炎輝、戴東雄，1986）。以歷史的角度來看，有其存在的依據。因為在農村社會，孩子的撫養，老年人的贍養、衣食服務、疾病護理等，一切都是以家庭為單位，以家庭成員代際間的分工來完成。換言之，在中國傳統社會形成以家族為中心的特色，絕大多數的國人從生到死的確是固守在家族範圍之內的。當然，古代行封建制度，亦為家族制發達之原因。

若就此而言，臺灣現行親屬責任仍是

立基於父權主義與延長家庭的假設與價值觀之下運作，並未考慮到家庭結構、社會環境與價值觀的改變。首先，就家庭型態觀察，臺灣社會有核心家庭化的趨勢。依據齊力（1990）的研究，近二十年（1965-1986）的家戶型態的變遷中，核心家庭從31%增加至54%，擴大家庭由31%降至8%。再就父母與子女資源的分配而言，就子女數而言，1951年平均每一名婦女生育7人，1961年時降為5.6人，1971年已降為3.7人，1995年更降為1.8人，亦即老年後子女所能分擔照顧風險的來源為之減少。另就歷年老年人生活費用主要來源的調查資料，可以發現老年所得主要來源由子女提供者由1986年的65.8%降至1996年的48.3%，2000年的資料更降至47.1%。至於由親友扶助的比例也由1986年的2%降至2000年的0.5%。

另外，就單親家庭的數量而言，有顯著上升的趨勢。Huang（2000）利用1980-1995年的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來估計單親家庭的比例。他發現在1980-83年間約每25個有18歲以下小孩的家庭才有一個家庭為單親家庭（4.05%），但在1992-95年間上升為每18個家庭便有一個單親家庭（5.59%）。另就失業率而言，臺灣的失業率已由1996年平均2.60%，失業人口為24萬餘人，增加至2001年平均4.57%，失業人口達45萬餘人。再就低收入戶致貧原因的瞭解，歸因於殘障的比例由1968年的7.1%升高至1996年的26.5%。

綜合前述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經濟弱勢人口的形貌在轉變，除老年人外，未來身心障礙者、單親家庭及失業人口將是

主流。然而，若依據現行親屬責任原則的運用，這些人將會是最易受到侵害的人口群。

此外，我們也要瞭解維繫傳統家庭功能的社會基礎已經被減弱了，這包括交換能力的減弱與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在現今強調個人主義的時代，當成員無意願進行資源共享，或資源共享相對影響到成員的生活品質時，社會應如何的看待。特別是，在強調普世人權價值時，政府是否應有積極的作為？依據老人福利法的規定，若子女有能力但不照顧老人時，就屬老人保護的內容，因此社會救助必須與老人保護相結合，而非逕以親屬責任婉拒對申請者的照顧。

另外，就法令本身而言，對於親屬責任的規範亦有不一致的地方，此包括法規本身與不同的法規之間。首先，社會救助法中所稱低收入戶，係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標準以下者（第四條）。換言之，其以「個人」為單位來計算最低生活費。此外第八條規定：「依本法或其他法令每人每月所領取政

府核發之救助金額，不得超過當年政府公告之基本工資。」亦係以「個人」為單位。簡言之，在強調親屬責任的同時，社會救助未考慮到家庭的規模，仍有個人主義的色彩。

再就不同法規而言，也出現有不一致的情形。以老年人口群為例，除了「社會救助法」對低收入老人生活扶助外，尚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的敬老福利生活津貼等現金給付。然而，此三者資源計算單位與給付單位上卻有相當的差異，如表三所示，這反映了政府對家庭責任的界定上有不一致的情形。值得深思的是為何「敬老福利生活津貼」（亦即針對中高收入老人的給付，可稱之為中高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其所得及資產單位均為個人，反而沒有親屬責任的規制？此是否說明社會對於低所得者親屬責任的控制較強，而對於中高所得者反而寬鬆？這究竟是符合誰的利益？又是維護了誰的價值觀呢？

表三 親屬責任在不同財力調查方案的比較

	社會救助法（低收入老人）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
所得單位	全家人口（未超過最低生活費標準） （92 年度臺北市為每人每月 13313 元）	全家人口（未超過最低生活費標準之 2.5 倍） （92 年度臺北市為每人每月 19593 元）	個人（年綜合所得 50 萬元以下）（即每人每月在 41667 元以下）
資產單位	全家人口（92 年度臺北市為動產每人每年以 15 萬元為限，不動產每戶以 500 萬元為限）	全家人口（92 年度臺北市為動產單一人口未超過 230 萬，每增一人增加 35 萬；不動產每戶未超過 650 萬）	個人（土地及房屋價值 500 萬元以下）

	社會救助法（低收入老人）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
受益單位	全家人口（視等級而不同）	個人（每月 3 千或 6 千元）	個人（每月 3 千元）
全家人口範圍	(1)直系血親。但子女已入贅或出嫁且無扶養能力可資證明者，得不計算。 (2)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旁系血親及負扶養義務之親屬。 (3)綜合所得稅列入扶養親屬寬減額之納稅義務人。	(1)申請人及其配偶。 (2)負有扶養義務之子女及其配偶。但出嫁之女兒及其配偶不予列入。 (3)前款之人所扶養之無工作能力子女。 (4)無第二款之人，以實際負擔扶養義務之孫子女。	無

## 伍、改變之點

親屬責任與財力調查之間的討論，事實上就是家庭責任與政府責任分工的討論，更廣義的說就是家庭政策的討論。在這當中，政府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其企圖，意欲達成其所期待的行為模式。從歷史經驗來看，兩者之間的互動是競爭的與轉換的（Finch, 1989）。就意識型態而言，右派相對左派是較強調家庭成員的責任。無論如何，政府的政策都有一些特定關於家庭應如何運作的假設，不論其是否正確或對影響的團體適當與否，這些假設都被持續的增強。

依據 Harding（1996）所建構「家庭—政府關係模式」的觀點，其中一個極端為權威模式（authoritarian model），其目的在達成符合目標家庭型式的一致性，此是由擁有權力者決定。在此模式之下，嚴格的規範誰能合法的與誰同住，誰對誰有責

任，要負什麼責任等。另一個極端模式為放任模式（laissez-faire model），政府並不企圖對家庭有任何運作影響，政府及政府其他機構的角色是完全的自由，端賴個人自由與選擇，政府對任何型式既不支持也不懲罰。

在這兩個極端模式之間，Harding 認為尚有五個中介模式：(1)特定領域責任的強制執行：如對於特定親屬的照顧責任，有一些懲罰機制的設計確保其執行，英國對於扶養義務人（liable relative）的規定即是例子。(2)誘因的使用：在此模式之下，懲罰與獎勵同時被運用，以確保對期待的家庭行為給予激勵，而不適宜者給予阻難。該模式的目的仍是在控制或影響家庭生活，只是使用較溫和的方法，最明顯的作法為給予經濟的誘因，如對於結婚夫婦給予租稅減免，但是對於同居者則否。(3)政府的行動是基於對家庭運作的假設：例如假定女性為依賴的論點，當然此種假設的



不正確就會導致對象的剝奪與不利。(4)支持與替代家庭：政府並不期待扮演規範者的角色，只是在現況之下支持家庭。當然，在支持的同時也可能替代了他們。(5)政府回應需求與需要：此模式的特點是在於對個人與家庭的需求作充分的回應，但是並不企圖指引或影響家庭應該的型式。換言之，福利制度可能會無意的促進家庭的變遷，但實質上它們是要回應家庭變遷的需求。

就 Harding 的觀點，政府與家庭的互動為「控制」與「支持」間的選擇，亦即「控制」與「不控制」之間。就財力調查中親屬責任的規範而言，其所反映的也是此種互動關係之一，在這些模式間要如何的選擇呢？有幾個思考之點必須要留意。

首先，社會救助的目的究竟為何？依照其原始的用意是在維持國民的生存權，這應該是主要的目的。當然，社會救助如同其他社會福利在「照顧」(caring)之外，也有其「控制」(control)的目標，也就是要符合社會的價值觀。在此之下，親屬責任就是希冀所要達成的目標。換言之，財力調查所扮演的角色就包括「生存保障的安全網」(福利)與「親屬責任的安全網」(道德)之間作選擇。就此兩者之間，依據憲法與社會救助法的規定，生存權的保障應居於首位。在此情況下，以單純的拒絕給付來成就親屬責任是不合宜的。

其次，關於親屬責任的運用合理嗎？此涉及到親屬的認定與範圍大小。親屬範圍的認定必須認知到彼此之間的資源轉移

是可能的，而非不實際的。若據此觀之，以延長家庭的思考必須要有一調整。也就是說要思考到現實家庭的狀況。否則不僅不務實，更會使家庭成員間關係緊張。

再者，財力調查中親屬責任的弱化真會減低家庭的功能嗎？由於社會救助的目的只是在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親屬的支持在其他方面仍有許多參與的空間。換言之，照顧是多面向的，在家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若將其轉移到情感上的交換或許更好。特別是若擔心社會福利措施會替代家庭功能，現今社會保險與國民年金的規劃不是有同樣的問題，也會降低子女奉養的功能，為何政府在建立年金保險制度時比較沒有引起爭議呢？簡言之，社會救助只是維持基本的照顧，因此不管子女基於感情或是道德，仍可以對父母盡孝，並不影響到所謂替代的功能。

最後，我們是否如 DiNitto (1994) 所指出的，對於低收入戶的行為呈現過度的監查 (over-scrutinizing the poor)，易言之，我們有同樣的標準要求非低收入者嗎？以民國 86 年新增綜合所得稅列入扶養親屬寬減額之納稅義務人應納入全家人口範圍的規定而言，其基本的思維是既是申報節稅，相對就有扶養責任。然而若檢視稅法的規定，如表四所示，這些可以申報為扶養親屬者多已為親屬責任的範圍內，重要的是此為稅法中的措施，也是一般人選擇合法節稅的管道，且寬減金額亦屬有限，實無必要再作為監控的機制。

表四 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的規定與條件

扶 養 親 屬	條 件 規 定
本人及配偶的直系尊親屬（如父母、岳父母、祖父母）	(1)年滿六十歲 (2)未滿六十歲而無謀生能力
子女	(1)未滿二十歲 (2)滿二十歲而仍在學校就讀 (3)滿二十歲以上而身心殘障 (4)滿二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
同胞兄弟姐妹	(1)未滿二十歲 (2)滿二十歲而仍在學校就讀 (3)滿二十歲以上而身心殘障 (4)滿二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
其他親屬或家屬（如叔、伯、舅、姪、甥、孫等）	(1)未滿二十歲 (2)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 (3)需與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同一戶籍。

在這些思考點之下，對於社會救助財力調查中有關親屬責任（全家人口範圍）的界定，有如下的修正建議，如表五所示。

表五 親屬責任現行規定與修正建議的對照

	現 行 規 定	修 正 建 議	說 明
直系血親	除子女已入贅或出嫁且不具扶養能力可資證明者，得不計算外，均要列入。	父、母及未成年子女列入計算。成年子女單獨計算。	以核心家庭為思考，並著重成年子女的自尊。
旁系血親	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者均要列入計算。	取消	旁系血親的共享不切實際，且同一戶籍有其他社經因素的考量。
列入扶養寬減額的納稅義務人	申報扶養親屬的納稅義務人要列入計算。	取消	此為合法的節稅選擇，且寬減額低於最低生活費。

總言之，親屬責任的原則是有必要的，重點是適不適當。Chambers（2000）就指出親屬責任政策，不管曾經有何貢獻，但是也常造成方案所要服務的對象不符合資格的危害。Rodger（1996）也指出此種情形成為政府無法扮演「家庭支持」（supporting of families），反而淪為「家庭警察」（policing of families）的角色。社會救助的目的係生存權保障，過度賦予擔任

道德守門人的角色時，反而阻礙了生存權保障的目的。社會救助的申請本就含有烙印，親屬責任還需要再扮演阻難嗎？當社會救助宣稱的使命是保障國民最基本的生存權時，而生活困境的國民卻被排拒在外，這是社會救助的成就，還是對社會救助的反諷呢？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任）

### 📖參考文獻：

- 孫健忠（1999）社會救助與社會控制：以社會救助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 1，頁 77-109。
- 齊力（1990）臺灣地區近二十年來家戶核心化趨勢的研究。臺灣大學社會學刊 20，頁 41-83。
- 鄭麗珍（2000）親屬互助原則與社會救助審查－以女性單親家庭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 30，頁 113-143。
- 戴炎輝、戴東雄（1986）中國親屬法。臺北：三民。
- Chambers, D.E. (2000)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Programs: A Method for the Practical Public Policy Analyst. Boston: Allyn and Bacon. 3<sup>rd</sup> ed..
- Crowther, M.A. (1982) Family Responsibility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in Britain Before the Welfare Stat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5(1), 131-145.
- DiNitto, D.M. (1994) Should We Expect to Change Client's Behavior in Exchange for Aid? No.. in H.J. Karger & J. Midgley (eds.)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Social Policy.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Eardley, T. et al. (1996) Social Assistance in OECD Countries: Synthesis Report. London: HMSO.
- Gilbert, N. & Terrell, P. (1998) Dimensions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Boston: Allyn and Bacon. 4<sup>th</sup> ed..
- Finch, J. (1989) Family Obligations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rding, L.F. (1996) Family, State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 Rodger, J.J. (1996) Family Life and Social Control: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 Macmillan.